

一、中共推動「大興調查研究」落實情形之觀察

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研究員蔡文軒主稿

- 中共宣布開展全黨大興調查研究工作以來，習近平及黨政高層赴各地考察，地方政府亦自組專題調研，除期許新黨政班底即時掌握各領域危機狀況，亦要求基層鞏固「習思想」並為中央決策背書。
- 習近平地位牢固，不至於要透過調研進行黨內大肅清，而是藉此要求下屬表忠誠，惟推行至今，開始出現負面影響，被批評為「作秀式」調研。

2023年3月19日，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《關於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》，宣布要從12個包括政法、金融、意識形態等諸多領域方面，在全黨範圍內「大興調查研究」工作。方案指出，當前中國各種困難問題比以往更「嚴峻複雜」，迫切需要透過「調查研究」深入基層找到破解難題的辦法和路徑。新華社於7月4日發布的《22個故事講述習近平的調研之道》文章就講述習近平在1984年擔任河北正定縣縣委書記的時候如何運用調研方式解決當地問題。有黨媒發文指，自中共「十八大」以來，習近平高度重視調查研究工作，稱之為中共的「傳家寶」。習近平自2013年至2023年間在不同場合反覆強調「調查研究」的重要性，並在2022年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稱要「大興調查研究之風」。

（一）《關於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》內容

《工作方案》要求縣處級以上領導班子成員每人牽頭1個課題開展調研；明定6個步驟：提高認識、制定方案、開展調研、深化研究、解決問題、督察回訪；調研方法上要堅持因地制宜，綜合運用座談訪談、隨機走訪、問卷調查、專家調查、抽樣調查、統計分析、互聯網與大數據等方式；內容上按照12個方面內容布局展開，包括：習近平對該地區該部門或領域做出過的重要批示問題、深化

改革開放中的重大問題、全面從嚴治黨中的重大問題、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長期未解決的老大難問題等，具體主題各省按自己的實際情況擬定，如遼寧針對破壞營商環境、基層「微腐敗」的課題，內蒙古則緊扣習近平交代的建設「模範自治區」事宜，江西則發揚毛澤東的「尋烏調查」精神；針對調研成果，不僅要運用習思想來分析和論證調研中的問題，同時也要把調研成果形成「問題清單、責任清單、任務清單」，定期追蹤和督察回訪調研課題。此外，調研期間要採取「四不兩直」的方式，輕車簡從、厲行節約、不搞層層陪同。上述方案發布後，中共江蘇、遼寧、廣西和上海等省委與省政府，以及公安、金融等部委都跟進表態，因地制宜印發關於「大興調查研究」的具體實施方案。

(二)「大興調查研究」運動各地落實情況

江蘇省在3月15至31日就已經展開10多場調研工作。江蘇政府稱，省委和省政府幹部要牽頭「圍繞在科技自立自強上走在前、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上走在前」等六個課題展開專題調研。4個月後，在習近平到江蘇省蘇州和南京考察時也不忘提到，江蘇一直是他的「關注點、調研點和研究點」；在中共金融系統方面，4月4日中國央行副行長宣昌能在中國金融學會的2023學術年會上聲稱，金融系統「大興調查研究」的對象包括如何將各類金融活動納入監管，以及「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」；除了實權官員，擔任人大和政協的二線高官也「受中共中央委託」紛紛出動「調研」。自3月中旬起，胡春華等12名全國政協副主席率調研組到地方調研，如沈躍躍到山西、王勇到上海、周強到廣西。隨後，多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也加入調研行列。其中肖捷赴廣西、鄭建邦赴山東濟南和青島、丁仲禮率隊赴湖南、山西和貴州省畢節市、何維赴山西、武維華率隊到海南。4月18至19日，中共政治局委員、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李鴻忠在浙江、上海調研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浙江和上海都是習近平曾經主政之地。李鴻忠在上海期間去了虹橋街道古北市民中心，這個地方正是習近平2019年首次提出「全過程民主」口號之地。

(三) 習近平「大興調查研究」運動的考量

觀察習近平近期「大興調查研究」運動可能具有以下考量：第一，「大興調查研究」的目的是防止在中共官僚消息流通封閉的體制下，下級造假報告導致上層錯誤決策的事情發生。發動「調查研究」的時機點發生在今年「兩會」之後，似乎是要讓新的黨政班底上位後對各領域危機的狀況進行摸底。李強在中共「兩會」記者會和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皆聲稱，新一屆政府第一件事就是要「大興調查研究之風」。「調查研究」即是要推動各級官員到一線基層去考察，以「摸清實情、找準癥結、提出對策」。同時，要求運用現代統計、民意調查等科學的方式進行「調查研究」，也是為了盡可能準確發現基層的實際情況。

第二，「大興調查研究」的方式，要求官員以習思想作為對照來自我檢視及檢視下級，並且要結合習思想來分析調查結果。除了是進一步鞏固習思想在基層的落實，防止懶政與躺平，要求官員理性決策、定期到基層去觀察民生，也是要求下級做忠誠度表態的一種方式。如內蒙古的調研工作便是以習近平要求建設「模範自治區」的指示入手；而中共公安部黨委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則強調要確保中共的「政治安全」、「認真肅清流毒」、「孫力軍政治團夥嚴重違紀違法問題」；民主黨派人士與人大、政協高層更是以「受中共中央委託」的名義到基層去重點調研。

第三，推動「調查研究」要求全國上下模仿習近平的調研態度，或是某種程度上在為中央決策的正確性背書--表示政策出臺的過程是經過「調查研究」、理性分析的結果。其中，新華社為烘托「調研」運動的刊文《22個故事》便指出，「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、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」的經濟政策是習近平在2020年經過調研分析後的決定。

(四) 「大興調查研究」的負面影響

「大興調查研究」運動發動至今不到半年，已經開始出現一些負面影響，被批評為「作秀式」調研。4月13日新華社主辦的《半

月談》發文批評調研出現「新形式主義」，文章指各地調研出現「材料流轉」、「調研推卸」、「求量不求質」等「異化苗頭」；有領導幹部將「寫材料」的任務「推卸」給基層。有的基層幹部「一個月領了幾十項調研任務」，因此發生「調研的人不寫材料，寫材料的人則沒資格調研」的情況；此外，「逐級調研」還淪為「逐級要材料」。因為領導幹部普遍事務多，領了任務卻沒時間調研，只能把任務「分解外判」，而「材料收集整合」就是「最高效」的方式。除此之外，「調查研究」還發生工作量「加碼」的惡性競爭情況。例如有的省委（如江蘇）要求從省委常委做起，下至縣處級以上領導班子成員每人牽頭 1-2 項重點課題調研。

有分析稱觀察過去毛澤東在 1961 年「大興調查研究」運動的後續是發動黨內大清洗，因此指習近平運用此手段或也有發動清洗的需求。按目前的進度研判，習近平在黨內地位牢固，不至於要透過「大興調查研究」來搞黨內大肅清。如上所言，習近平的意圖更像是利用運動來推動黨內理性決策的過程、加強習思想向下灌輸落實，以及要求下屬表忠誠的一種手段。